

#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费冬梅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日益密切,日本人大批来华,留下了大量中国游记。仅《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一书就介绍了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时期逾四百种旅华游记,单是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游记,就非常可观。在本文中,笔者拟以形象学为方法,对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旅华日本人撰写的近二十本游记所塑的中国形象进行全面的考察,并进一步探讨日人所塑中国形象的特色及成因,简要分析其影响。

**【关键词】**游记;中国形象;先见;互文写作

**【作者简介】**费冬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专著《沙龙:一种新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1917-1937)》。

**【原文出处】**《东吴学术》(常熟),2020.4.56~76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近代时期日本人的旅华游记,时间主要限制在明治和大正时期,即1868-1926年到访过中国的日本人的旅行记录。因为论述的需要,也会涉及这个阶段之外的文本,比如1862年“千岁丸”访华随行人员的中国观察记录及1928年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旅行回忆。<sup>①</sup>和早年游记主要出自随军记者不同,明治中期以后,来华日人身份多样,有政客、官员,也有学者、文人、商人等,因而游记也日趋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这些文字中,文学家所写的大抵可以称为纪行文学,而大多数游记,多是平铺直叙,重在记录当时的观察和感受,文辞润色不多。但也正是这些平淡无华的游记,相对而言更为客观,更具有史料价值。据张明杰介绍,1980年出版的《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对东洋文库收藏的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时期逾四百种中国游记,作了简要介绍,而此书前言尤言这个数字仅仅是在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的九牛一毛。<sup>②</sup>

对于笔者而言,最关心的是明治和大正两个时期的日人旅行记。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处于晚清至民国的转折期,政治文化发生巨变,中日关系也相应发生巨大转折,此时期的游记对于研究日本人的中国观及近代中日关系史有重要价值。所以,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选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部分文本作深入分析。这个时期的史料有日本游摩尼书房出版

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和《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这两套集成是日人旅华游记的精选本,据张明杰先生介绍,共收录中国游记65种。而本论文涉及到的日人访华游记,主要来自张明杰先生主持翻译出版的“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系列”,是数目众多的日人游记的精选本。其基本情况,列表如下<sup>③</sup>:

作者	书名	访华年代
纳富介次郎	《上海杂记》	1862
日比野辉宽	《赘疣录》	1862
日比野辉宽	《没鼻笔语》	1862
名仓予何人	《海外日录》	1862
小栗栖香顶	《北京纪事北京纪游》	1873
曾根俊虎	《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记》	1875
竹添进一郎	《栈云峡雨日记》	1876
冈千仞	《观光纪游》	1884
内藤湖南	《燕山楚水》	1899
宇野哲人	《中国文明记》	1906
德富苏峰	《七十八日游记》	1906
股野琢	《苇杭游记》	1908
小林爱雄	《中国印象记》	1908
夏目漱石	《满韩漫游》	1909
中野孤山	《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	1906
德富苏峰	《中国漫游记》	1917
芥川龙之介	《中国游记》	1921
吉川幸次郎	《我的留学记》	1928
仓石武四郎	《中国留学记》	1930

## 一、双重中国认知:分化的近代中国形象

本文选择的史料相对于全部的日人访华游记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从这十几本游记中还是可以发现,晚清以来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察相当全面,涉及平民、官员、知识分子;也涉及风俗、文化、文物、制度;同时也有大量的对自然环境的观察和描写。

### 1. 繁华的城市与凋敝的乡村

在笔者所考察的这十几本日人游记中,晚清各大重要城市,上海、北京、天津、苏州、杭州、成都、汉口等,都在游记中占有重要分量。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名胜古迹大多位于大城市,此外,也和这些日人的旅行目的有关。城市的发达繁荣是中国形象的重要一面,其中,上海作为东方的巴黎,受到最多的关注。

小林爱雄初到上海,即被上海的繁华所震撼,上海街头鳞次栉比的西式建筑,铺着石头和砖瓦的路面,都显示了上海的现代和繁华。<sup>④</sup>股野琢亦如此,他在航行之际,发现“舟愈进,河愈阔,帆樯林立,船舰碇泊,不知其数。两岸巨屋层楼,连檐屹立,大壮人目”,并为此赋诗:“申浦繁华胜所闻,埠头船舰簇如云。人言市况压香港,大厦康衢车马纷。”<sup>⑤</sup>冈千仞笔下的上海租界是“市街间大路,概皆中土商店,隆栋曲榭,丹碧焕发,百货标榜,烂然炫目。人马络绎,昼夜喧阗”<sup>⑥</sup>。其他城市的繁华,也受到关注。宇野哲人初到天津,“看到租界地之宏壮,市况之殷賑,再次为之吃惊”,“天津不仅租界之地砖瓦建筑之大厦鳞次栉比,中国街亦不愧为直隶总督所居之地,中国样式之华丽建筑亦不少”<sup>⑦</sup>。

然而,这些日人很快便开始“吐槽”起中国城市的市容市貌来。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以西方国家为追赶目标,把“公共卫生”作为实现文明开化的内容之一,开始为建立“清洁的文明国家日本”而努力,近代意义的“卫生”概念开始引入日本<sup>⑧</sup>。明治政府进而成立了“卫生局”<sup>⑨</sup>。“卫生局成立后,着手推进垃圾处理、市街道清扫等公共卫生事业,开展传染病的预防。随后,近代‘卫生’概念与这一词汇在日本被广泛接受,卫生和健康问题也从关乎个人生理机能的私事,转而成为政府施政的要务,近代卫生事

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sup>⑩</sup>明治以后,当这些已经接受并养成了“卫生”习惯的日本人,到了中国之际,中国都市市政建设的种种“脏乱差”的情形便显得尤其难以容忍。

市街的脏乱,并无城市之别。其中,上海作为晚清大都市,受到了最多的关注。中野孤山对上海街道的观感是:“城内商店鳞次栉比,朱色、黑色的招牌装饰得美观漂亮,绸缎店铺尤为醒目。但是,道路狭窄,路面疏于修缮,常有雨水积成水坑,粪便混在其中,臭气刺鼻,使嗅觉器官麻痹。这些令我等外国人不堪忍受。”<sup>⑪</sup>曾根俊虎印象中的天津市街:“行走在路上,便会觉得臭气冲鼻,一堆堆污秽的垃圾让你见了眼睛生疾。道路极为狭窄,凹凸不平,两侧高而中央低,恰如枯水干泥的肮脏河道。”<sup>⑫</sup>中野孤山笔下的宜昌:“市街的特点是肮脏凌乱,非言语所能描述……粪水横流,臭气熏天。苍蝇蚊虫聚集在小店的食物上,市民对此习以为常,见惯不惊。”<sup>⑬</sup>股野琢则总结道:“清国市街,除北京、奉天外,广不过十步,石路湿滑,人马杂糅,所谓肩摩毂击,良有以也。”<sup>⑭</sup>国内其他市街也是同样的情形,甚至京城也不例外。“大街和胡同的角落、胡同里的墙边,到处都是拉撒粪便的地方。所以走在北京的街上,总能闻到充溢在空气里的粪便的气味,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sup>⑮</sup>

可以说,中国城市街道的污秽不堪、狭窄、脏乱、缺乏维护和修缮,几乎在每一位旅行者的笔下都出现过。租界和中国区城市卫生的状况之别犹如天壤。冈千仞在燕京的经历可谓典型:

佐佐木姓导观租界。康庄四达,左右植乔木,各国公衙高揭国旗,互竞宏丽,而洋廛仅仅十数户,他皆招商局曹舍。行里许,沿江西折,望城壁屹然,道路狭隘,人马旁午。舍车而步,至带河门。市店杂沓,秽臭冲鼻,觉头痛涔涔。<sup>⑯</sup>

有学者曾对冈千仞笔下的上海城市形象作过研究,详细讨论了冈千仞眼中上海的“二元对立”现象:“千仞笔下的上海,既有壮大、精致、华丽,充满了自然美,以租界为代表的西洋文明,也有部分士大夫文化以外,拥挤狭窄、充满恶臭的中国百姓的生活空间,以及鸦片流行造成的社会颓废,在其中很容易看

出‘西洋’与‘东洋’、‘近代’与‘前近代’的二元对立。……冈千仞站在‘异域人’的立场上,没有任何顾忌地生动刻画出‘进步的西洋’与‘落后的中国’。”<sup>①</sup>冈千仞笔下的上海的“二元对立”很具代表性,在其他旅华日人的游记中我们也可看到租界的繁华与老市街的肮脏同时并陈的现象。例如小林爱雄就抱怨道:“上海开化已有六十余年,在此期间,租界的西式建筑从三层变成了六层,宽度从四米变成了八米,但中国的街道依然一成不变。”<sup>②</sup>当小林爱雄对上海街头鳞次栉比的西式建筑和电车之精良惊叹之际,却发现中国人不坐电车而偏爱选择乘坐独轮车代步——“一个人在车后推,中央平板车上的左右两侧竟坐了六七位乘客”<sup>③</sup>。与租界被喻作“东方巴黎”相比,上海的中国城区则被喻为“乌龟池畔”。

那么,这样一个缓慢落后的“乌龟池”是怎样一幅市容市貌呢?来看当时报纸的记载:“凡不洁之处,未有如上海城内之甚者也,即在中原诸省,凡不洁之处,亦未有如上海城内之甚者也。”<sup>④</sup>甚至以风景优美著称的城内公园豫园也是“溺桶粪坑,列诸路侧,九曲池中水不畅流,且其中掷瓜皮者有之,倒垃圾者有之,以最雅之处易而为齷齪之场”<sup>⑤</sup>。对这种租界华界截然二分的情景,中国人也颇多感慨。郑观应就在文章中抱怨道:“余见外国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内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sup>⑥</sup>

外国租界道路的齐整洁净,和租界市政管理的先进密切相关。有材料记载了当时租界修整道路的措施:

如界内之地,概用碎石砖填垫,俟人足迹履平则又垫,凡四五次。另用石片石子以千斤铁滚过,用马拖平,必期坚固,遇雨不潦而止。雨后即补填。掘地数尺,接埋水管,以通积水,又有马车上安水柜,尾横铁管,上皆细孔,水从孔出,沿街遍及不使灰尘飞腾。<sup>⑦</sup>

而对于中国道路交通的恶劣状况,中国政府则关注不够,为了应对,官员和士人发明了一种风雅的对策,出门之际手握香珠以避道路上的臭气。冈千仞就不无讥讽地记录了这样一则事例:

竹孙示念珠,以名香炼成者。曰:“路上污秽恶

臭,使人不胜,故手香珠薰鼻端。”中土街巷湫隘,尘秽盆集,恶臭不可胜,香味亦不可少者。<sup>⑧</sup>

据熊月之《略论近代上海市政》一文研究,上海华界在租界近代路政的强烈刺激下,后来也开始“仿租界之式”,向租界的路政看齐,开始兴办自己的路政。“从1870年代始,兴华界路政,‘如租界之法以治之’,已成为华界有识绅商时常谈论的话题。到1890年代,华界绅商终于化议论为行动,城厢内外、闸北、吴淞和浦东相继成立了马路工程局,具体负责马路的辟设。1905年,地方自治运动兴起,上海绅商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等市政机关,把‘开拓马路’‘清洁街道’‘列入市政建设的重要项目之中。然而由于种种限制,华界实际筑成的道路仅30余条,远不能和公共租界、法租界相提并论”<sup>⑨</sup>。

一些大城市也着力于道路的改造,比如1906年宇野哲人访华之际,就观察到北京街道的修葺工程:

大街之改造,悉已完成。学日本之方式,以石块铺地,其上灌以石灰,用碌碡压实。中央为车马道,两侧为人行道。其间设沟渠,栽柳树,安路灯。苦力们不断撒水,防止尘埃飞扬。均是先进文明之设备。<sup>⑩</sup>

两年后到访北京的小林爱雄也注意到了北京街道的进步:

这里不愧是迁金以来的都城,大街上的道路甚至比东京的还要好。人车道的区分就不用说了,有的地方把车道分为马车道和货车道。这些地方道路宽阔,共分为五个车道,据说始于明代。排水沟都是用砖砌筑的,十分宽大,甚至能站进一个男人,不过现在已被废弃,成了明代的遗物。<sup>⑪</sup>

然而这种经过修葺的道路只是很少一部分,更多的城市街道仍然是旧有的恶路。宇野哲人自陈:“予曾三次于雨后雇人力车访友,于潦水中颠簸,浑身上下通湿,犹如落汤鸡一般。”<sup>⑫</sup>“初次跨进中国街之人,均有为其恶臭所熏之感受。予亦如此,行不及五六街区,已觉闷郁,难以呼吸,匆忙退出,方觉安稳。”<sup>⑬</sup>一方面建筑本身的格局狭窄,缺乏修缮,一面则是市民的不讲公德不讲卫生,加剧了街道的肮脏恶化,这又导致日人对中国人素质和生活习惯的

严厉批评。在众多游记作者笔下,晚清之际的中国人严重缺乏隐私意识和卫生观念,缺乏公德。而日人对中国各大城市街道不洁的恶劣印象,与同时期访日的中国人对日本印象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sup>③</sup>。

近代中国城市市街虽然肮脏,但高官府邸、古董店铺尚且不乏富丽堂皇之所。相比而言,中国的乡村则呈现出了普遍凋敝的面貌。与城市景观大量占据日人游记相比,中国的乡村相对而言较少受到游记作者的关注。即便偶尔进入旅行者的视野,也大多都是“远观”而来。这些远观而来的乡村形象大多是荒凉、凋敝、穷陋的。1906年,宇野哲人到中国旅行,经过塘沽港口时,竟误以为附近的村居是“猪圈”<sup>④</sup>。因为有军事目的在身,曾根俊虎一路很少参观风景名胜和都市,相反大多辗转于各地乡村野道,他对乡村的观察较其他旅行者为多。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关于晚清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状况的记录。曾根俊虎对经过的乡村观察得十分仔细,对各个乡村的人口、地形、物价、风俗、经济状况都有详细的记录,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晚清乡村状况的重要史料。总体而言,曾根俊虎对中国的乡村评价是穷陋居多。富裕的也有,但极少。他笔下的张戈村:

该村人家有一百五六十户,贫寒简陋至极,路上堆满污秽之物,臭气冲鼻。拾粪人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看到马来驴来,就争先恐后地带着粪筐赶来等着马驴排粪。当地人之状况与我邦维新前之乞丐相差无几。<sup>⑤</sup>

环境闭塞,乡民无知,便喜围观。曾根俊虎和同行者休息之际,“衣衫褴褛之人围观如堵,拾粪之人背着粪筐从四面围上来,甲去乙来。孩童满头白蚤,手搔不止。有一女子行走不便,拄拐蹒跚而行,见轿中所铺红色地毯而显出一副魂飞魄散之表情,看到眼镜而惊讶万分,连呼‘怪哉!怪哉!’啧啧嘈杂尤甚。”<sup>⑥</sup>“眼镜”这一代表现代文明的新鲜物什让村民竟至于“魂飞魄散”,可见当时当地乡村文明程度之落后,信息之闭塞。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众多游记总体呈现出的晚清中国乡村是一幅蔽塞、肮脏、穷陋的面貌。晚清

战乱频仍,“在大规模民众起义被镇压以后,半无产阶级兴起了,即令下层人民的国内迁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缓和这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产生的现象。不论城乡地区都广泛存在着赤贫如洗的民众,他们生活不稳定,居无定所,受饥馑、天灾和传染病的打击最重”,农村的经济凋敝又影响到了清末社会的其他方面,“大多数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生计维艰,稍有风吹草动、农业歉收或税收加重,都会使流浪民队伍扩大”<sup>⑦</sup>,导致贫苦农民向城市转移,成为流浪于城市的苦力、人力车夫和乞丐群体,这些人群在晚清日人游记中也频频出现,成为最终形成负面中国形象的重要因子。

## 2. 粗鄙的普通民众与儒雅的中国士大夫

游记作者普遍注意到了中国不同阶层的人所具有的不同的特性。下层百姓和上层知识分子之间脱节导致出现了两种景观两个世界,也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中国形象”。

首先,晚清城市华洋杂居,贫富分化的现实状况,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平民和上层文化人在性情素养上的巨大差异,在日人眼中,中国的士大夫“以衣冠文物自负,观其文辞,则郁乎如天仙;观其容仪,则嗒乎如神人”,“若夫闾阎小民,眼无一丁,鄙猥丑秽,卑污贱陋”<sup>⑧</sup>。日人游记作者在谈论中国人的国民特性之际,普遍区分了“上等人”和“下等人”两个阶级。“上等人”中包含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富裕商人等,“下等人”则以平民、苦力、乞丐、侍从为主。这些赤贫的人群,苦力、人力车夫及乞丐,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讲究礼仪和道德,一切都只为了生存,谋生是他们的第一要务。当日本旅行者和这个群体遭遇之际,便生发出了许多负面印象。

“苦力”“人力车夫”“乞丐”是日人游记中最常出现的中国普通国民,在绝大多数游记中,都提到了苦力嘈杂、乞丐围追的场景。这些可谓日人对中国印象最恶劣的部分。每每提到这些人,日人的反应都是极其厌恶。而在处理与这些中国人的关系中,日本旅客普遍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即便深入腹地的川陕地区,亦是如此。我们来看一下游记文本中是如何叙述苦力的。

1899年湖南如此形容中国苦力：“到了车站，又是中国式的没人管，苦力和车夫们争着挤着要运行李，有的竟然进到车厢里边，其间的嘈杂难以言表。据说要是不小心把行李给了他们又疏于监看，马上就会被偷走。”<sup>⑧</sup>1906年中野孤山笔下的苦力：“开始装卸货物时，苦力一拥而上，那混乱嘈杂的场面，就像是暴乱开始一样。”<sup>⑨</sup>1909年，夏日漱石拜访了日本殖民地满洲，他对苦力的书写更具歧视性：“苦力温顺、健壮、有力、勤快，你就是从旁边参观都会觉得心情舒畅……他们就像没有舌头的人一样，从早到晚默默地背着那沉重的大豆麻袋从一楼到三楼爬上爬下循环往复，他们的沉默和有规则的运动、他们的忍耐和元气简直就像命运的影子一样。”<sup>⑩</sup>“船刚停稳，苦力集团就像炸开了的蚂蜂窝一样，立刻开始吵吵嚷嚷。”<sup>⑪</sup>夏日漱石访华是在1909年秋，而芥川龙之介是1921年，虽然相隔近十年，但中国苦力的处境却似乎一点也未得到改善。芥川对苦力的印象如此恶劣，直接将其“物化”，将苦力喻作“蛇”“蝗虫”“牛马”。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作者固然是实录旅途中的亲身经历，但也不乏有作者如中野孤山在游记中不时插入道听途说的“传闻”，将苦力的“盗窃成性”渲染得淋漓尽致。经过这一番人云亦云之后，中国苦力的形象在日本游客心中已然“定型”。经过口耳相传，这份“中国印象”便不断传播开来。

除了苦力，引人注目的还有“人力车夫”的形象。芥川龙之介详细记叙了在中国遭遇人力车夫的情景：

刚走出码头，几十个黄包车夫一下子就把我们包围了。“我们”指的是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君、友住君以及国际通讯社的琼斯君加上我一行四人。原本“车夫”这个词留给日本人的印象绝不是脏兮兮的，反倒是那种威猛的气势，常给人一种仿佛回到了江户时代的心境。但是中国的车夫，说其不洁本身就毫不夸张，而且放眼望去，无一不长相古怪。他们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各自伸着脖子大声地叫喊着，不免令刚上岸的日本妇女感到畏惧。<sup>⑫</sup>

芥川龙之介对上海的第一瞥是人力车夫的“肮脏”和“吵嚷”，车夫喋喋不休地要钱，失败后却一脸“恬然”。再度看见人力车夫之际，芥川龙之介便以

“令人恐怖的”来形容他们。“于是我只要一看到黄包车夫，立刻便会像念诵驱魔的经文一样，嘴里连连说着‘不要不要’。这是由我口中说出的值得纪念的第一句中国话。”<sup>⑬</sup>来华之前，看过前人的游记，听过身边朋友的劝解提醒，“人力车夫”在日本人的印象中已经成了一个“蝗虫”一般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不论是持何种立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存在相似性——这些来自异邦的观察，并非都带着帝国主义的傲慢和偏见，也非完全是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有意扭曲，其中不乏比较客观的事实呈现。

更加触目的是关于“乞丐”的大量叙写。乞丐一直是各年代游记的常见描写对象。竹添进一郎是近代中日建交后最先深入到中国西部腹地川陕地区游历的日本人。在他笔下，“乞丐”是触目的“一景”：“当唐县、保定之间，丐人载路，见客则遮前尾后，啾啾乞哀，如秋蝉咽树。”<sup>⑭</sup>当他就餐时，发现“楼上多丐人，拥客乞钱，摩之不去”<sup>⑮</sup>。冈千仞走访上海老城区之际，发现的现象令他愕然：“自新北门而入，门外丐徒，褴褛百结……盲者、聋且哑者、恶疾者，尾人后乞钱。闾巷隘窄，臭气扑鼻，时见僵尸。[……]乞儿蹑后，秽臭纷然。”<sup>⑯</sup>1899年内藤湖南访华之际发现，即便在公园附近也有大量乞丐聚集：“归途中路过留园，亭榭重叠的幽趣，石刻楹联的古雅，堪称中国山水风景的最好的标本。而门前群集的乞丐令人瞠目。”<sup>⑰</sup>小林爱雄游记中也多次提到中国的乞讨现象：“我从车窗往外看，发现有一群乞丐，每人手中都捧着篮子，嘴里在说：‘赏给一文钱吧。’我扔给其中一位老人一文钱，他向我行了敬礼。看到能要到钱，附近的男女老幼一大群人争先恐后地聚拢了过来。”<sup>⑱</sup>这些关于“苦力”和“乞丐”的印象，构成了日人游记中独特的对于中国人的负面记忆。<sup>⑲</sup>

陈志让在《军神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一书中指出，1900年代中国的绅士集团分化了，有的与工商阶级结合，要求民主立宪的现代化，有的加入了军队，与军人群众结合，要求共和，有的与秘密结社联络来推翻清室，大部分都继续拥护清室，保存了绅士的政权，企图安定社会局面。<sup>⑳</sup>其实在此之前，晚清文化人已经显示出明显的思想分歧，分化为洋务派、保守派和传统绅士派几类。在这些游记中，我

们可以看到这几类文化人纷纷登场,呈现出了各不相同的形象。与游记作者对中国平民大多持蔑视态度截然相反,日人普遍对中国文化人持有较高的评价,甚至到了敬佩爱戴的程度。譬如芥川龙之介,在上海与章炳麟、郑孝胥、李人杰等人会面后,深为敬佩,开始反过来反思日本文化界的轻浮浅薄。冈千仞也感慨“下等劳动者——苦力之肮脏是事实,然官吏及富民,其颇有潇洒风采者亦不少”。一方面,这是中国阶层分化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也和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有关。日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痴迷在19世纪末依然没有打破,即便在这些日人游记通篇贬斥中国之际,创造了灿烂古典文化的中国“传统”依然征服着这些日本人的心。他们仍然会时不时地感慨中国古文明的伟大浩瀚,也便自然而然地对传承古文明之风的中国人抱有好奇。

旅行期间,拜访中国文化名流是日人的一大要务,冈千仞曾自陈访华目的,“弟此游非漫然放浪于山水,将交诸名士,磨珑学问人物,所谓到处与贤豪长者交是也。伏请不鄙弃岛域之一穷措大,收列下交之末,赐源源来往,何幸尚之!弟客居无一事,唯见诸名士为公务,请谅此诚。”<sup>④</sup>“唯见诸名士为公务”可以说道出了众多游记作者的心声。

对于中国士大夫,日本人总的印象是儒雅、博学。他们之间常常进行笔话交流,并且互相赠送礼物。这些日人虽然不通中国口语,但大多掌握了中国的文字。因而,与中西文化人交流相比,中日两国士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在交往上更容易形成认同感。冈千仞的《观光纪游》记载了大量和晚清士人交流的笔谈。冈千仞访华接触的多是晚清的官绅名流,或与之诗文酬唱,或共赴宴饮雅集,冈千仞与他们笔谈,所论多为学问或时事。冈千仞向清朝士人赠送自己的著作,而清朝士人则回应以赠诗。比如俞樾向其赠诗并撰小序曰:“鹿门先生自海外来访我吴下,兼以所撰《读史偶笔》《尊攘纪事》见赠,因赋赠一律,即希吟正。”<sup>⑤</sup>也有一些人给冈千仞的著作写序,比如王韬给《苏杭日记》撰序,张焕纶为《燕京日记》撰序,陆纯甫为《沪上再记》撰序。礼尚往来之余,冈千仞对这些友人印象颇佳,对俞樾、王韬、张焕

纶均有很高评价。竹添进一郎也与中国士人交往密切,李鸿章、俞樾等就为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撰序推介。

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较多的,还有内藤湖南。正如钱婉约所概括的,“内藤湖南交往、交流的对象,从政治思想立场来看,大致是沿着这样的一条线索移动更替的:维新时期的清流派、帝党(而不是保守腐败的后党)——新政改革时期的皇家宗室、立宪人士(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党)——民国时期的前清遗老、政府高官(而不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西方文化讴歌者)。内藤湖南所交往的,往往是这条线索上具有学者情怀、拥有学术资源、做出研究业绩的社会贤达、官僚学者、文人雅士”<sup>⑥</sup>。旅行期间,内藤湖南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西文教习陈锦涛、育才馆汉文教习蒋国亮和上海文廷式、宋伯儒、张元济等进行了笔谈来往。这些人都是晚清得潮流之先、通晓时务之人。内藤湖南对严复的印象非常好,形容严复乃晚清俊杰:“他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政变以后人们噤若寒蝉的时期,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的人物。”<sup>⑦</sup>此外,内藤湖南还与陈锦涛、蒋国亮两位青年才俊进行了笔谈,这两位都属于清廷少壮有为的人才。从两人的笔谈中可以看出,中国士人当年很积极地寻找治国方略,很主动地与内藤湖南讨论时局<sup>⑧</sup>。

像大多数日人一样,宇野哲人也拜访中国文化名人。在游记中,宇野哲人记录了和叶德辉的见面情况。他形容叶有着极好的风度,“爱客,毫无城府,予新来,亦以青眼相待,循循不倦”<sup>⑨</sup>。而德富苏峰除了政府官员之外,也拜访了相当多的学者,如沈曾植、姚文藻、李梅庵、郑孝胥、王国维、蒋汝藻(古籍收藏家)、罗振玉等。他对这些学者的印象也以正面为主。芥川龙之介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印象十分恶劣,然而对中国文化人,却难掩崇敬之情。他拜访章炳麟,形容“只有那双细细的眼睛,在一副高雅的无框眼镜后面不时冷冷地微笑着,显示出他绝不是一个凡夫俗子”<sup>⑩</sup>。他感动于郑孝胥的平和和礼数周全——“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我每每刚一叨起香烟,郑先生就会马上站起来为我点火,令我颇为诚

惶诚恐”——甚至反过来开始批评日本人在礼仪上的欠缺<sup>⑤</sup>。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游记在出版之前大多经过了作家本人的删改修订,公开出版发行的文字并非全部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感受。以岗千仞为例,冈千仞在书中指出中国有三毒:烟毒、贪毒和六经毒,对平民吸食鸦片多有记述并表达了十分厌恶反感的态度,但因为人情世故的考虑,岗千仞并未在最终出版的成书《观光纪游》中提及好友王韬吸食鸦片的细节及其对此事的真实态度。但从发表于日本媒体《邮便报知新闻》“文苑雅赏”汉文专栏的《支那漫游日记》里,我们可以发现冈千仞最初得知王韬吸食鸦片之际十分震惊,是愕然而不解的<sup>⑥</sup>。可以看出,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所引起的岗千仞的态度也大为不同。对待与自己相熟的文化人予以宽容和理解,而对于平民因为无所顾忌,则十分尖锐而犀利。这一点也是日人游记对待中国平民与士人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

### 3. 迥异的“风景之发现”

日人的旅行大多是按图索骥,一路追寻书本里所熟悉的传统中国名胜古迹而来。从游记中他们对每一处景点历史来历的熟稔就可以看出。作为从小便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的日本文化人,对书本和诗歌里的中国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一旦亲眼目睹现实中国礼崩乐坏的情形,不由得十分震惊。相对于对街道不洁、平民敲诈勒索、乞丐横行等社会现象的失望,传统文化在晚清中国的衰落无疑让这些作者更觉触目惊心。

游记作者发现,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平民,对古迹都不加认真保护。德富苏峰对此多有记载,他发现中国陵园的守陵人只知道一味地向游客索取导游费,却从不打扫陵园,也不好好管理,任人拿走各种绿瓦黄瓦<sup>⑦</sup>。天宁寺“已经呈现一片荒凉的景象,塔的下面到处都是野菊花,而且那只刻着‘皇帝万岁万万岁’并记有明朝嘉靖年号的钓钟也已经被野草覆盖了。我们正想进门的时候,突然蹿出一只凶猛的蒙古犬冲着我们吼叫”<sup>⑧</sup>。黄鹤楼“周围臭气熏天,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sup>⑨</sup>。至于北海,“这里唯一旧貌未变的就是在牛溲马尿之中巍然屹立的乾隆御制‘琼

岛春阴’的诗碑、喇嘛塔及三希堂的石刻”<sup>⑩</sup>。更让他震惊的是,南京明孝陵上的墙砖和瓦砾直接被中国人一点一点卸下搬走,当作建筑材料贩卖:

孝陵位于钟山南边的独龙埠。途中不断地遇到一些来来往往的自行车,车上载着一些厚三四寸、宽五六寸、长一尺四五寸左右的石块。走近一看,才知道都是些可以用双手举起来的旧砖瓦。原来这些旧砖块是明朝宫殿围墙上的砖瓦,天长日久城墙变得越来越破旧,砖瓦被人们一点一点地卸下来搬走了,只有城门还留在那里。据说以前曾经有个德国人来到这儿,按五块钱一块买过一些砖瓦,并把它们送到了柏林博物馆。如果好好擦一擦,所有这些砖瓦表面就会清清楚楚地显露出一些洼下去的雕刻和浮雕。这上面不光记载了产地名,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字,有的多达两三行。这些大块的砖瓦现在却和普通的砖瓦一样,被拿到市场上当作建筑材料出售了。<sup>⑪</sup>

这种对文化景观极端淡漠的态度让这些日人感到震惊和愤怒。内藤湖南发现,作为中国科举文化象征符号的贡院肮脏不堪,“污秽肮脏莫过于北京的贡院……院内草高过顶,考官所在的房屋里,到处都是守卫的粪便,臭气冲鼻,污秽肮脏实在难于言表。”<sup>⑫</sup>当宇野哲人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景观惨遭破坏,愤而将愚陋的中国平民称为“群氓”：“祠堂庭内,或耕为田,或杂草丛生,更有甚者,在庭内积藁,其旁尿臭熏鼻。二程子及朱子则无需赘言,范文正公之正大,邵康节之风流,千载之下,皆足钦仰。时人或尊其道,或怀其人,而建祠奉祀。然无学无耻之徒,冒犯神灵,亵渎圣域如斯,实不可理喻之群氓也。”<sup>⑬</sup>

苏州的寒山寺是日人来华旅行最爱去的景点,然而怀着憧憬而去,却每每失望而归。内藤湖南看到的寒山寺破落不堪:“寺堂全无,佛像安置在一座龌龊的庵里,当时有一个僧人默然枯坐。散乱的屋瓦石基中,我看到刻着明崇祯年号和‘寒拾遗迹’四字的石额横在地上。文衡山用草书写的张继‘枫桥夜泊’的诗碑嵌在半塌的墙壁上,一半已经剥落,几乎要埋在尘埃臭秽中。”<sup>⑭</sup>和芥川龙之介、内藤湖南一样,1906年宇野哲人来华也特意来此探访。在此

之前,宇野哲人通过阅读中国古典诗文,对寒山寺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想象:“寒山寺距枫桥四五町,在枫桥镇之后。若夫一诵《枫桥夜泊》诗,则孤舟泊于芦荻之间,烟波苍茫之彼方,透过郁郁苍苍之森林,梵钟之声,隐约传来之情景,宛然浮于眼前。”然而现场探访之后,不禁大叹“诗之欺我”:

此寺为寒山、拾得之遗址,数年前,荒废已不见踪影。文征明手书《枫桥夜泊》诗碑,亦没于草茅之间。时江苏巡抚端方氏,知我邦之人若来姑苏,则必游此寺。遂新加盖造。诗碑为好事者打毁,部分被劫走,二十八字中可识者不过六七字而已。<sup>⑥</sup>

对于人文景观的被破坏,日本游记作者大多持贬斥态度,但对中国自然景观的美丽,这些作者无一例外地表示了惊叹之情。在芥川眼中,中国不时迤邐而来的人文、自然景观仍然洋溢着浓郁的诗意,灵隐寺“桥下的水声如玉佩鸣响。两岸皆幽竹,翠色带雨,几似媚人,近乎于石谷的画境”<sup>⑦</sup>,而西湖更是诗画一体:“长长的白堤横卧在浮萍稀疏的湖中,特别是我们将要靠近的时候,有一个老人一边挥动着柳鞭一边悠然策马而行,此等应该最具诗中之景。白居易咏西湖之诗云: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镫辔玲珑。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即使有昼夜的不同,仿佛亦有相似的意境。当然这首诗也与咏断桥的一样,引自池田氏之著。”<sup>⑧</sup>对中国国民、政体多有批判的德富苏峰,在旅行途中也常被中国美丽的风景打动,感叹“被烟雨打湿的竹林那翠绿欲滴的颜色,就是把全日本的竹林都拿来恐怕也抵不过”,并写诗一首:“平原踏尽到山根,秋雨潇潇红叶繁。道入信阳看似画,疏松密竹水云村。”<sup>⑨</sup>

类似的对中国自然景观的赞美在这些日人游记中比比皆是,可以说,中国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在游记作者心中的印象呈现出了两极化的趋势,对中国人文景观的衰败,他们普遍表达了失望之情,而中国或壮丽或优美的山水自然则让这些作者着迷不已。

## 二、中国形象之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日人游记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是沉滞颓废的,是一个衰老、颓废不堪、肮脏、孱弱的大国形象<sup>⑩</sup>。而这样的中国形象的形成有多方面因素,以下

分别做简要分析。

### 1. 游记中的偏见和先见

西方人来华旅行之际,常因语言不通生出许多麻烦,相比而言,日本人访华在语言方面的障碍要少许多。与英美游记作者常常抱怨语言不通相比,日本作者大多有着语言上的“优势”——虽然中日两国语言不通,但文字又有相通之处,加上不少文化人有着良好的汉学修养,通汉文,看得懂中国文字,相比同时期来华的欧美人士,作为近邻的日本人显然有更多的途径了解中国。除了游记,他们可以直接阅读中国古典文本,包括政治、历史、文学等各个方面,这就为两国士人的沟通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本文所考察的明治、大正时期的游记中,有相当多的作者曾和中国人进行笔谈,“以笔代语”,讨论时局、文化、习俗及进行诗词酬应。这些游记中收录的大量笔话、笔谈,就证明了这一点。小栗栖香顶访华期间,在龙泉寺和僧人本然和尚有过四次笔谈,讨论宗教话题,每一次都详细记录;内藤湖南在《燕山楚水》中记录了与严复、王修植、陈锦涛、蒋国亮、张菊生等人笔谈的内容;冈千仞在《观光纪游》一书中更是记载了上百则与中国官员、士人的笔话内容,外交、军事、习俗、教育、政局无所不谈。与冈千仞笔谈过的张焕伦形容他们之间的谈话:“口不相习,以笔语焉,每见辙尽十数纸。君好诙谐,兴所到,刍狗俚虫,土木轩冕,蔑如也。终日相对无声息,唯谩谩纸笔声与呵呵狂笑声相间不止。若意有不慊,则笔间便飒飒挟风雷。”<sup>⑪</sup>遇到相投的士人,比如冈千仞拜访梦薇之际,两人“笔翰如流,顷刻间累十数纸”,“二宫姓及濯追踵,环坐拥桌,各手一支笔,畅谈终日”<sup>⑫</sup>。如此文字相通,在表情达意上也便更加心领神会<sup>⑬</sup>。

日人游记作者不仅可以和中国人笔话,他们同时还十分精通中国的文化典籍。更有少数作者兼通汉语,可以直接与中国人交流,不仅无沟通障碍,甚至直接以汉文文言文来写作游记。在本文所考察的近20本日人游记中,就有5本是以汉文写作的: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事·北京纪游》、冈千仞的《观光纪游》、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仓石武四郎的《中国留学记》和股野琢的《葦杭游记》。排除政治上

和宗教上的主观偏见,这种语言上的互通对游记作者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中国形象是比较有帮助的。这就与同时期来自欧美的旅行者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影响的日本人,在理解中国文化和阅读中国典籍上更有优势,从整体上说,游记中呈现的中国形象也较同时期的欧美游记要客观全面一些。这也是为何在整体形象呈现负面之际,仍然有为数众多的日本游记作者对中国士人、人文及自然景观不吝赞誉的原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同处汉字文化圈,存在历史文化同根的因缘,但近代日人游记仍然存在种种先在的偏见——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偏见”比“客观”更重要,它反映了近代中日文化冲突的真实形态。偏见之一在于,一些游记作者往往采用“中国人”这样的全称整体性叙述,来表述他们在现实中见到的局部地域中国人的印象。中野孤山在通篇《横跨中国大陆》中,没有提及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而往往是以“苦力”“华人”“蜀人”“蜀都妇女”“轿夫”这样的整体性名词来记述中国人的人情风俗。夏目漱石在《满韩漫游》中也很少对中国人进行正面和细部描写,书中甚至没有一个中国人有名有姓,他形容笔下的中国洋车夫、马车夫、苦力及普通中国民众,用的形容词是“肮脏”“鲁莽”“奸诈”,最后直接说“中国人果然是肮脏的国民”<sup>⑧</sup>。事实上,这些游记中所写到的中国人的负面形象,有的可以说是人类共有的特性,而非专属于中国人。用全称指代或者轻蔑比喻的方式来形容中国人,显然反映了这些作者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与此同时,这种印象也和他们接触的人群所属阶层有关。刘禾在分析美国人亚瑟·史密斯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时指出:“这种外国人与当地仆人之间的阶级差异总是被利用来建立‘中国国民性’的理论,而与此同时,理论背后的主仆关系却被掩盖和忽视。”<sup>⑨</sup>刘禾的这一指认某种程度上也适合中野孤山、夏目漱石等人。因为接触到的大多是中国中下层平民,这些中下层劳动人民的一些局限性就被部分游记作者夸大化,阶层之间的差异被置换为国民性的本质差异,某个阶层的特性被认为整个“中国人”的特性。

此外,一些游记在描述中国国民性的时候,存在

“语言霸权”。类似“冬眠的狗熊”“蜘蛛”这样的歧视性修辞在日人游记里比比皆是。在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中野孤山等人的游记里,对中国人的鄙视和轻蔑表达得最为激烈,书中充斥着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对中国人的丑化、鄙夷和非议,常将中国人喻为低人一等的动物,如“蝗虫”“蛇”“愤怒的蜂窝”之类。在这些日人游记中,还出现了一些称呼中国人的套话,比如“猪尾人”“清国佬”<sup>⑩</sup>，“清国佬”这个词在夏目漱石的《满韩漫游》中出现了多次,凡是提到中国人处,夏目漱石几乎全以这一蔑称代替。而“猪尾人”则在曾根俊虎的游记中频繁出现,曾根俊虎多次直接称呼中国人为“猪尾人”：“乘客尽是猪尾人,早已把床位都占据了,我辈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松延氏就躺在甲板上,我硬挤在接近居室的地方,让猪尾人的鸦片烟呛得终宵难眠。”<sup>⑪</sup>言语之间,充满蔑视。

游记中的这些“偏见”又和作者的“先见”有关系,这种先见又分为以下几种。首先,这些偏见受到当时日本国内中国观的影响。日本人不管用哪一种文类塑造中国,都离不开其文化传统里业已存在的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在西方势力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力图从封建形态脱胎而向资本主义迈进,经过不断摸索,创立和建成了东方第一个近代形态的国家,并成功地跻身于西方列强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从思想文化到政治外交,中国始终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和因素。这一时期,殷鉴论、唇齿论、敌对论、亲善论等各种主要的对华认识类型在此期间一并展开并相互论争,不仅对当时的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形成了近代日本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的基本框架。”<sup>⑫</sup>1862年,日本在“锁国”200多年后派遣第一艘官方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随着随行船员访华游记的传播,中国日渐凋敝的现实也逐渐为日人所知。在此背景下,受到西方冲击的日本吸纳了西方强权政治的逻辑和弱肉强食的主张<sup>⑬</sup>。1885年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思想,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反映了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后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变化,是日本崇尚强者文化传统的反映,也是中国与日本在东亚政治舞台上地位变化的写照。此后,“脱亚入欧”成为日

本的基本对外战略及日本政府制定对华侵略政策的理论依据<sup>①</sup>。这些日本国内的对华认识,直接折射到晚清日人游记之中,对后来游记中对于中国形象的呈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虽然日人游记作者对中国的态度明显有别,作者文化水准不一,但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日本整体中国观的影响。例如中野孤山的来华动机便是“负起打开宝库之重任,聊以报答国恩”,而小林爱雄则鼓励日本人到中国开发事业,认为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还远远不够。

内藤湖南在来中国之前,显然已经对近代中国的衰落抱有“先见”,在看到中国衰败的乡村风景之际,立即感叹“这些都是我预想到的中国的风景”。小林爱雄的游记更是偏见频出。在1906年来华前,他感觉自己是去一个“沉睡的国家”旅行,就像从“巨人国”去“小人国”一样,充满了对日本民族的自信和对中国的轻蔑。来中国之前,即已形成对中国的不良印象:“有一个国家,那里数亿的国民打着响亮的鼾声已鼾睡了数年。[……]古代,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被誉为世界三圣之一的伟人,曾建筑过长达万里的长城,曾出现过无数位英雄和诗人,但对于这些,现在的人们已毫不在意,只是沉醉在美酒和鸦片的香味中悠悠沉睡。”<sup>②</sup>在中国旅行途中,出于这种先入为主的心理,小林爱雄对诸多生活细节做出了过度解读。比如,他在拜访盛宣怀之际,发现宅内“所有的家具都散发着黑光”,由此而来的是“心中涌上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快,四处很难找到有生机勃勃的东西”。在就餐之际,面对主人的热情,小林浑然不觉,反而对餐桌上的筷子发起了感想:“特别是筷子,虽是银质的,好像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前端带着黑色的被牙齿咬过的痕迹,既然这能代表身份的显赫,所以一联想到曾经是怎样的亡灵咬过这筷子,我就不禁觉得筷子上冒鬼气,真是毛骨悚然。”<sup>③</sup>这番对中国筷子发生的感想,明显有着“先见”的影响,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文明衰弱、沉滞,这种“过度解读”,连小林自己都意识到了,“之所以说中国菜的味道复杂,或许不单是因为饭菜本身,而是由于添加上了这些心理因素”<sup>④</sup>。

其次,这些偏见受到来华之前“期待视野”的制约。对中国典籍的接触和阅读,让这些游记作者在

来华之前就对中国充满了知识上的向往和美好的想象,已经形成了比较定型的对中国的理解,或者说是一种“想象”的“偏见”——这种理解在他们来华之前的著作中大量呈现,或在散文,或在小说中。日本文化人大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经常接触中国的经典读物,因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风物、自然、故事等都熟稔在心。他们所学习或理解的中国,与其说是现实的中国,不如说是文本所描述的中国,尤其更多的是“诗词里的中国”。其中,中国古典诗文是构成中国想象的一个主要来源。日本人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这种“偏爱”,导致了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多是“神秘的”“美丽的”、充满了诗书礼仪的一个文明国度。日本人所想象的中国是诗词里的中国,自然是一种经过提炼和美化的“中国影像”,即便在“古老的中国”,这些美丽的“影像”也并不存在。

当他们一旦真正踏入中国国土,将历来对于中国传统的向往和敬慕,转化为一种深刻的文化记忆,以此来对现实的中国予以观照之际,通过与现实中国的对比,便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今不如昔的怅惘和愤慨。反映到游记中,便在文本里形成了两个中国的碰撞:“想象里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两个不同的形象在这些日人游记中双声喧哗。中国不再是以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呈现在这些异域人的眼中,而是以一个内部自相矛盾和分裂的综合体,现出了它复杂的面向。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游记作者普遍经历了一个“诗意的幻灭”的心理历程。

对中国充满了美好想象的宇野哲人,到了中国后,按图索骥地访问名胜古迹,一见风景名胜,即想起书上所云何事,结果大失所望:“读中国人之文章,让人错觉世上真有如此之仙境,往而观之,只不过是鄙俗俚境。此类事甚多,描述与现实相差极远。”<sup>⑤</sup>在芥川旅行的过程中,“期待视野”也不时冒出来观照现实并与已有阅读经验展开对话。看见乌篷船,他立即联想到“南宗画”;看见黑夜中浮现出来的白墙宅院,立即想起中国小说中神狐鬼怪故事;看到苏小小墓,想起孙子潇的诗;看到玉带桥,想到恽南田的画。而现实显然不如诗文中那般美好,于是感叹说“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

国,猥亵、残酷、贪婪”<sup>⑤</sup>。小林爱雄感触尤深,在赴中国几乎每一处景观游览之前,那些和这些景致相关的诗文典故,便会强迫症一样浮现在他脑海:“这里是小故山(小孤山),是苏东坡在‘山苍苍江茫茫’中吟唱的地方。”“从小故山路过澎浪矶,来到陶渊明曾作《归去来兮辞》的彭泽县附近。”<sup>⑥</sup>“傍晚到了九江,这里是白居易泪湿青衫的浔阳江。”“这里是李白的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中所描绘的地方。”<sup>⑦</sup>像这样的说法比比皆是。于是当小林爱雄从诗文里的充满了雅致想象意味的诗意中国转向现实中国,看到江边乞丐簇拥、水面垃圾漂浮的场景,失落便在所难免。

值得注意的是,还存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对中国的“先见”,即以一种“东方主义”式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所导致的有意“误读”。正是基于对中国古典文本的阅读而来的唯美而神秘的中国情趣,导致了部分游记作者对现实中国理解的阻碍<sup>⑧</sup>。对于这种过高或偏离的“期待视野”,部分游记作者其实也有反省,如内藤湖南便告诫将要游清的日本人,以后去中国考察之际,一定要去除“先见”,不要把中国的文辞虚饰信以为真的<sup>⑨</sup>。对此,反思最为深刻的还属吉川幸次郎。1941年,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吉川幸次郎对日人对中国的“误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作为异族人,在观察中国人时,日人受到本国民族习性的影响,导致观察出现了偏差,给中国形象蒙上了迷雾。吉川指出日本之前对中国文化的输入,是一种选择性的输入,一方面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这些输入的书本知识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另一方面,日本人往往会推广发扬适合日本国民习性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就导致日本人从书本中得出一个“传统中国的幻想”,而当这一幻想面对现实中近距离的接触之际,便产生了失望和拒斥的情绪<sup>⑩</sup>。可以说到了问题的关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日本国内的“先入之见”,西方人的中国观也对这些游记作者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曾根俊虎就在《北中国纪行》中多次提到他读过的某个英国人游记中的观点,并多次引用以证实自己的观察。而美国人亚瑟·史密斯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被翻译成日文版后,也在相当大

程度上影响到了日人对中国人的评价<sup>⑪</sup>。不仅日本国内的中国话语对这些日人游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欧美人的“中国观”和部分游记也在这一“丑化中国”的潮流里扮演了重要角色。

## 2. 游记文体的影响

游记之间的互文性是日人游记呈现出的一个鲜明特色。在日人游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前人游记对后人游记写作的影响。年代靠后的作者大抵读过前辈的游记,甚至在出发之前特意阅读以资参考。这种有意的写作和主动的阅读,构成了日人游记之间密切的互文。而造成这种互文性有多重原因,其中之一是当时的旅行路线<sup>⑫</sup>。

从旅行的地域来看,明治、大正时期的日人在中国的旅行已经深入到中国大部分城市。中野孤山的旅行地域主要是中国西南成都、峨眉、重庆等巴蜀地区,而大多数游记作者如德富苏峰、内藤湖南、芥川龙之介等人的足迹则更广阔,到了中国东南沿海、东北、西北和中部大城市<sup>⑬</sup>。因为旅行地域的不同,作者对中国的印象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差异性。访问边疆或区域性城市的作者,接触的大多是地方基层官员或平民,对中国的印象以负面居多,而访问北京、上海、武汉、苏州等经济发达城市的作者,虽然对市政交通都持批判态度,但明显对中国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和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欣赏和包容。这自然是因为晚清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巨大的差异造成的。以内藤湖南为例,内藤湖南在北京访问期间,与清廷的高级知识分子多有接触,相互讨论时局和中国文化,严复、王修植、方若等知识分子赢得了他的好感和尊重。这些知识分子怀抱忧国忧民之心,并且有报效国家之志,满腔热情却得不到抒发。内藤湖南对他们报以深深的理解和同情。而中学教员中野孤山访问蜀地,接触的主要是平民阶层,对中国人特性的评价就以负面居多。他在游记中频繁抱怨当地平民的粗鄙野蛮自私自利。其中掺杂着不少前人的传闻和道听途说,带有强烈的主观意气,就不及那些拜访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作者客观,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人素质的等级差异<sup>⑭</sup>。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旅行者的旅行路线存在着相当大程度上的重复,比如谷崎润一郎

的旅行路线就和德富苏峰几乎一致,都是从朝鲜进入东北,然后转天津再至汉口,后下长江、登庐山,去南京、苏州、杭州游历之后,最后经上海回国。路线的相近使得这些游记作者笔下出现的风景名胜大同小异。此外,对前人游记的阅读也是构成游记互文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几位作家为例。芥川龙之介在来华之前曾发表过一篇小说《奇遇》,其中有一段对话,主人公“小说家”和一位“编辑”在对话中提到了众多旅华游记:

编辑 听说您要去中国旅行。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

小说家 我打算由南至北周游一圈。

编辑 都准备停当了吗?

小说家 是的,已经大体就绪了。只是原本应该一读的纪行和地志等等尚未读完,有些不知所措。

编辑(显得无精打采地) 那种书有很多吗?

小说家 远比想象的多。单说日本人写的,就有《七十八日游记》、《中国文明记》、《中国漫游记》、《中国佛教遗物》、《中国风俗》、《中国人气质》、《燕山楚水》、《苏浙小观》、《北清见闻录》、《长江十年》、《观光纪游》、《征尘录》、《巴蜀》、《湖南》、《汉口》、《中国风韵记》,还有支那……<sup>⑤</sup>

小说中提到的这些游记,有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七十八天游记》、冈千仞的《观光纪游》、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和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芥川龙之介来华之前显然对这些前人游记做了系统的搜集和阅读,甚至连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单篇中国纪行文,芥川也都做了搜集阅读。而在他本人的游记写作中,也不时地出现这些前辈的作品,与他本人的文章构成了一种隐形对话的关系。比如在写到中国妓女之际,芥川就给出了这样的指点:“此外,要想知道在中国怎样包养妓女,可以参照井上红梅氏著的《中国风俗卷》上卷的‘花柳词汇篇’。”<sup>⑥</sup>在西湖边上的旅馆里,看到穿长袍的中国老人和穿绸缎的中国少女,芥川又感到了和谷崎润一郎类似的浪漫情调:“看到这番光景,我又一次变节了,觉得这样的话,还是能够像谷崎润一郎氏那样,在一份浪漫的情调中善始善终的。”<sup>⑦</sup>看到一家叫做“楼外楼”的餐馆,芥川立即想到1920年刊登在《读卖新闻》上的武林无想庵

的一篇纪行文,想起武林无想庵夫妇曾在“楼外楼”用餐。

不仅在游记中提及自己的阅读史,在游览途中,芥川不时想起的中国古典诗词,也每每转引自所阅读的前人游记,比如他游览西湖之际,引用了白居易咏西湖之诗:“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蹬辔玲珑。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这首诗就转引自池田桃川。《中国游记》中写到的其他古典诗词,据芥川自己交代,均来自访华之前阅读的池田桃川的《江南的名胜史迹》。除了转引,芥川还每每在游记中将自己的观感和前人做一番比对,比如游览西湖后,芥川就对德富苏峰的西湖观表达了不同看法:“曾几何时,读过的德富苏峰先生的《中国漫游记》中,苏峰先生曾以若能担当杭州领事在杭州悠然度过余生视为人生之大幸。可是,对我而言,别说是领事,即使被任命为浙江督军,我也不愿意守着这样的烂泥塘,而更愿意住在东京。”<sup>⑧</sup>《中国游记》中类似的隐形对话还有很多处,不一一列举。

这种现象并非芥川一人独有,而是相当普遍。吉川幸次郎来华之前也读过内藤湖南、青木正儿、谷崎润一郎等人的游记。谷崎润一郎则读过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和《七十八日游记》——他在《苏州纪行》的前言中写道:“从德富苏峰氏及很多人的旅行记和叙谈中,我已数度听说了寒山寺是个没意思的地方,但是我却并不这么认为”<sup>⑨</sup>。而在股野琢《苇杭游记》中,也时见与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相关的诗文,如咏潇湘山水:“浊浪滔滔溯岳州,江源疑自九天流。蜀山此去三千里,梦绕栈云峡雨秋。”<sup>⑩</sup>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是后来者对前辈作品的主动阅读,另一方面,前人在写作游记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地给后来人“指点迷路”,主动和后来者对话。比如中野孤山就不止一次地告诫后来的日本人,千万要提防苦力偷盗,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上当受骗:“与之接触,要假装认真,施以虚礼,丝毫不能暴露自己的弱点,必须保持自豪与威严。以平易、率直、温顺、和蔼的态度对他们不是办法,轻信他们的话而仓促行事是最糟糕的事情。他们会利用我们容易上当的弱点,越发对我们彬彬有礼,以甜言蜜语引诱我们进入陷阱。对此,我们应

该幡然醒悟,不可小看他们的能耐。”<sup>⑩</sup>在游记中谆谆告诫后来者,一副如临大敌的情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野孤山写作《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这本书就是给日本的后来者做经验借鉴之用。

除了游记这一文体本身的互文性,游历的匆匆,也让很多旅行者在途中来不及仔细观察,这就一定程度上导致游记写作的浮光掠影,让作者的观察有失客观公正。那些能坚持当天日记的作者尚且能避免这样的问题,但相当一部分人因为旅行的匆忙,大多是后来的记述和回忆性书写,这就导致了游记存在捕风捉影的记叙,记载的故事并不是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一种传闻。比如中野孤山在游记中记载了李鸿章的房产情况:“李家有数百万元的财产,据说仅每月在芜湖的房租收入就有五千元以上。”<sup>⑪</sup>未经考证,即摘取传闻,付诸笔墨,写作上十分不严谨,给人留下走马看花、捕风捉影的印象,连作者本人都承认这是“对世间传闻从不同角度加以了取舍”。芥川龙之介在写上海的“罪恶”之际,用的也是“听说的”例子:“还听人说,坐在行驶的黄包车上的时候,帽子突然从背后被抢走的事情,在这里也像家常便饭一样。更有甚者,还有为了偷耳环而把女人的耳朵连根割掉的事。”<sup>⑫</sup>未做认真考证调查,就以讹传讹。此外,对一些负面的传闻,芥川龙之介也有意地夸大叙述:“听人说,还有‘魔镜党’和‘男堂子’一类惊人的东西。”<sup>⑬</sup>这样的夸大猎奇引人噱头的说法,在日人的游记中还有很多处。

“忙游”的匆匆,一边旅行一边写作的状态,导致这些访华日人缺乏深入的调研和反思,游记写作普遍浮光掠影。以对中国城市里的人力车夫的描写为例,民国初年动荡的社会经济关系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下层贫民。作为社会等级最底层的贫民,人力车夫只能得到最少的经济收益。人力车夫在众多的旅华游记中出现频率甚高,也是日本人接触中国人最多的一个群体。大量的日人游记对中国人力车夫表示出了鄙视的态度,认为他们肮脏不洁,抢生意时候一拥而上,并且营营于小利。但这些游记作者显然只观察到了事情的表象,对中国大城市人力车夫的生存状态和经济处境不甚

了了。同样关注人力车夫的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在《骆驼祥子》里描写的车夫,就更加的真实,这源于作家客观的态度<sup>⑭</sup>,而众多的游记作者,在旅行途中的匆匆一面里,显然缺乏老舍那样一个深入洞察的耐心。

### 3. 日本媒体的推波助澜

游记整体呈现出的负面中国形象,有异国游历本身的因素,作为外国人,在踏进异域之际,更容易被那些负面的场景和故事吸引。此外,还有游记作者主观的歧视因素在内,比如夏目漱石所持的非人道主义思想等作家个人因素,都导致这些游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大受影响,呈现出主观性、感性、非理性的特征。除了以上因素,还和当年发表这些游记的媒体的推动有关。

这些日人游记,有的尚且在写作过程中,便受到日本国内媒体的邀请,刊发、展示于日本国人。岗千仞的《观光纪游》中就记载了这样的过程。尚且在写作过程中,朱一新和岗千仞就多次讨论起这本日记:“访朱容生(一新),请余示近作。余曰:‘方草日记,不暇稿诗。’求观日记,余曰:‘日记,日录所见闻,余域外人,与中人异所见,此间不可辄示人。’曰:‘唯异所见,此仆所以强请。’余以其言切,诺之。”<sup>⑮</sup>朱一新认为此日记“唯异所见”,所以非要看看,而冈千仞虽然一开始不同意,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可见对自己日记的价值还是持认可态度<sup>⑯</sup>。于是,在旅行途中,岗千仞便受邀将部分日记刊载于日本媒体《邮便报知新闻》,社长藤田茂吉亲下按语:

冈千仞先生将游清国,同人祖筵于八百松楼,余亦列其席。尔时,余谓先生曰:“往年王紫诠游东京作我社宾,先生与生等与其数度往来,今先生西游,王氏必作东道主人。以先生之翰墨加此壮游,有王氏之周旋而探奇访胜,必有惊世之文辞,望先生收之筐底,归来之后割爱出之以示世人,以先生之意传之于世,而我以报纸助其事。”先生笑曰:“记事务欲公诸于世,何敢秘之。”乃与先生相约,尔后待其报。先生今践前约,赠寄《支那漫游日记》(汉文),又择其报告者报之外况。余不胜欣喜,立刻揭于报纸,以示同人及世之人,并以先生之游记刊于“文苑雅赏”,读者谅之。<sup>⑰</sup>

这种“有稿约在身”的不自由状态或多或少影响了游记的内容和价值判断,因为有任务在身,有时候就不免于要“制造诗情”——刻意酝酿“怀古的诗情”。一面是刻意的“怀古”,一面为了迎合国内媒体受众,却又常常刻意地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厌恶感”。

早在芥川访华之前,《大阪每日新闻》就打出了广告:《新人眼中的新中国近日将于本报刊载》。“中国趣味”的爱好者访华将有什么样的观感呢?“年青中国的风貌又如何?”报社资助芥川中国之行显然是“有备而来”,这也是因当时日本民众对“新中国”的好奇所致,整个日本社会,对中国充满了“想象”和“窥探”的欲望。1921年,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约作者,带着采写中国印象的任务开始了他的旅行,随后他将旅行途中写作的《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人们在建构他者形象或自我形象的时候,很懂得追求所谓的‘时代感’,或曰投其所好地满足受众的需求。”<sup>⑩</sup>可以说,芥川龙之介的游记写作便鲜明地体现了受国内媒体影响的特征。总体而言,芥川龙之介的这几本游记写得散漫潦草,为了迎合国内受众,对中国的描写基本上停留在负面形象的呈现上,除了很少的几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外,芥川笔下的中国是一个颓败、肮脏、混乱不堪的国度。甚至在写到中国自然景观之际,他也更多地选择记叙那些不美的一面。

在《长江游记》中,芥川几乎是“刻意地”表达了对中国的“厌恶”之情,将内心深处一种对中国人的好感“隐而不表”,而对现代中国做出了整体性的否定性评价:

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着吗?尤其提到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有一部值得自豪的作品吗?而且,国民不分老幼,都在唱着太平曲。当然,在年轻的国民中,或许多少还能看到一些活力。但事实上,他们的呼声中,尚缺少那种足以传达给全体国民的激昂的热情。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

趣味的崇尚者。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有心智昏聩,一定会比我这样的一个游客更加地不堪忍受吧。……<sup>⑪</sup>

“失望”是芥川整本《中国游记》的格调,对中国的旧日想象被现实打破,发现了想象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居住于干净整洁的日本岛国的生活经验,到了市政建设混乱不堪,国民缺乏公民教育及卫生理念的中国,这两者之间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巨大的落差在芥川的游记中体现得很鲜明。

除了受日本国内受众需求影响,写作状态对游记本身的写作也有影响。譬如芥川的游记在内容、文风、态度上都受到催稿的影响,他并非是完全“自由地”旅行和写作,而时常处于“不得不行”“不得不写”的压力之下,事实上,这种情绪他直言不讳地在文中说出来了。这种带病旅行的状态时常让芥川处于疲倦和紧张状态。

第二天,我就病倒了。第三天起,便住进了里见先生开设的医院,病名据说是干性肋膜炎。如果真的患了肋膜炎的话,我已计划好的中国之行就只能暂时推迟了。想到此,心中就愈加地不安,急忙发电报给大阪每日新闻社告知我住院一事。不久,收到了报社薄田氏“请安心静养”的回电。但若是一两个月一直住院疗养的话,报社方面也必然会很为难。看了薄田氏的回电,虽稍有安心,但想到自己毕竟有义务完成中国纪行的写作,心底便不由得更加忐忑起来。<sup>⑫</sup>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是从中国回到日本以后才逐渐写出的,但写作的过程也是不断被催稿的过程:

回到家里一看,有两封大阪总社发来的电报。内容是“恳请速寄文稿”。想到每次都给薄田氏添麻烦,于是深感不安。不过坦率地说,我虽感深深的不安,但免不了由于肠胃不好,或是连续几天的睡眠不足,或是没有灵感之类的理由无法动笔的情况。于是,看到电报,我就思忖着明天赶紧把《上海游记》的续篇写出来。<sup>⑬</sup>

在病痛之中被催稿尤其让芥川感到疲惫,他直言“因为写作的时候总要努力抑制住这种厌倦的情

绪,所以不可能写得出像样的东西”<sup>⑩</sup>,正如方维规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对所要看的及所要写的东西的选择,不写什么,写什么,怎么写,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例如心理因素和世界观的因素,还有异乡经历的好坏等等。换句话说,人们赞扬什么,拒绝什么,以及最终所获得的他国形象的好与坏,永远都是一个诠释问题亦即价值判断问题,常常与生活时间的长短没有多大关系。”<sup>⑪</sup>因为有“稿约”的压力,让芥川少了真正与中国老百姓接触的机会,而多选择日本国内所关心的中国名胜古迹之地旅行,游记写作于是呈现出情绪化、片面化和传闻化的特点,属于对中国印象的选择性书写。对此,芥川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

但事实上因身负报社的使命,所以也怀着一种自私的打算,一旦要写游记的话,还是应该尽量多去和英雄美人相关的地方看看,这样才能万事无忧。这样的盘算,从上海到江南一直都萦绕在我的头脑中,过了洞庭湖也没有能够抛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的旅行一定还会更多地接触中国人的生活,不会过多地沾染上汉诗与文人画式的学究气,而会更符合小说家的身份和口味。<sup>⑫</sup>

芥川本人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自己的游记因为约稿的缘故更多地染上了“汉诗”与“文人画式”的学究气。其实在其他作家身上,这种对旅行地域历史和文学典故大量介绍的习气也表现得十分鲜明。比如冈千仞、内藤湖南、宇野哲人等,每到一处,辄先引经据典,后才观赏自然景观。值得注意的是,芥川的小说作品和他的游记有着类似的功能,同样表达了对中国人的观感。但这个观感却和游记里充斥的大量的负面情绪不同。因为没有面对媒体受众的压力,属于个人化虚构写作,反而更为真实地呈现了芥川对中国的印象。《将军》《桃太郎》与《湖南的扇子》这三部作品就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芥川龙之介心中真实的中国印象。以《湖南的扇子》为例,《湖南的扇子》是芥川龙之介从中国归国后的作品,以中国平民为主角,讲述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故事,也表达了他对湖南女子的看法,写得非常隽永又富有深意。小说对中国女性的个性做出了新的揭示,表现了湖南女子的刚烈和勇敢,明确地表达了芥

川龙之介对中国女性的肯定和赞美,可以说,间接呈现了芥川真实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态度。

### 结语

本文考察的游记文本,从1862年到1926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日人在这些游记里记载了近代中国的风俗民情、物产地理、人文景观乃至政治外交,事无巨细,一一付诸纸上。

从文字形式看,这些游记大多以日文书写,少数如竹添进一郎、冈千仞、仓石武四郎的游记为汉文记录;从文体上看,大部分旅华游记采取随笔体,随时记录旅途中的见闻和感受,也有部分采用日记体,是于旅行时即兴写下来的,有的则是边写边发表于日本的媒体,比如德富苏峰的游记就在日本媒体《国民新闻》上连载,这种边游边写的文章,显然难以避免一些弊病<sup>⑬</sup>。总的来说,随笔体主观感受较多,而日记体则相对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中国的风俗地理及作者的行程见闻。除了当时的记录,这些游记中也有几本是事后回忆,比如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旅行记就是事后接受记者的访谈和自己的追忆。一般而言,一边旅行一边记录的游记更有史料价值,因为时间的关系,追忆体的游记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

这些游记作者旅行的目的也各自不同,有的作者,比如曾根俊虎,以军事勘察为主要目的,他的写作风平实客观,对旅行中遭遇的中国人情风俗、军事要塞、炮台位置等一一实录,并配有详细的插图。作为对华侦探纪行文,《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和岸田吟香的《清国地志》、井上陈政的《禹域通纂》等调查记录一起,对当年日本军政熟悉中国国情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是我们了解晚清军事史的一个途径。出于军事目的,侦探纪行文往往语言简洁,客观纪实。相比之下,文学家的游记因以游览为主,文风比较文艺浮夸,主观色彩较浓厚,比如芥川龙之介和夏目漱石的游记,更多地在表达自我的立场和主观诉求。

从内容上看,这些游记对中国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观察,涉及到国民形象、自然地理、社会风俗、都市市政、贸易、文明状况等。概括地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人特性的书写;二是对中国自然、人文环境状况的记叙;三是对中国的政治、规

章制度和民风民俗的记叙。中国人的特性是这些日人游记关注的重点。虽然这些旅行者身份各异,各自持有的旅行目的也不尽相同,并且旅游的地域也有差异,但都对中国人的特性做出了相当详细的观察和描述。除了中国人的特性,对习俗的关注也是这些游记的一大重点。这又分两个层面,一是早期对中国人具体习俗的谈论,有褒有贬,比如宇野哲人1906年到访中国,就对中国节庆十分好奇,详细记载了祭灶、迎春、除夕、元旦、上元节等节日风俗,语气较为客观,多有欣羨之意。后来的日人游记,对中国习俗的关注则以陋习居多,更多关注裹脚、抽鸦片烟、丧葬之奢靡等方面。例如,中野孤山、曾根俊虎在旅行中多次记载旅店的不洁、中国厨娘的不洁,态度由最初的好奇、热情逐渐转向冷漠的批判。到了德富苏峰访华之际,对中国的习俗几乎完全是批评了。

这些游记作者身份迥异,以文人、学者居多,其中有一部分作者是受日本媒体委托到中国旅行,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报刊连载游记。属于这种情况的有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内藤湖南。这样一种有目的的写作,也给旅行记带上了有色眼镜。还有一部分是自行游历,这类旅行记录大多很真诚。作者所记载的内容无外买书、与书店老板打交道、拜访学者名流等事宜。小栗栖香顶、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都属于这类比较纯粹的为学术而访华的一群——旅行只是他们在中国生活期间的一个插曲。除了文人之外,游记作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和政要,在旅行中,他们对中国的政体和时局十分关注,并从自己的视角指出中国的危机和存在的问题。其中,以冈千仞和德富苏峰对中国的政局观察最为犀利。冈千仞不仅与清廷高官和士人讨论中国政治外交,还热忱地献言献策,给盛宣怀、李鸿章等官员“上条陈”,并将自己的这些建议称为“药石之语”。与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等带着“任务”的旅行相似,德富苏峰的旅行也是有备而来,但显然,德富苏峰的野心更大,在行旅过程中始终在观察中国的时局。此外,游记作者还包括一些受邀到中国进行“教学”的日本教师,中野孤山便属于这类日本教习。

游记作者对中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十分矛盾而

“纠结”的,因而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呈现出了复杂而多义的内涵。他们一面沉湎于想象中的“诗文里的中国”,不愿意相信现实,一面又面对现实中国的衰败、肮脏油然而生失望、厌弃之感。于是芥川龙之介产生了从“诗文里的中国”向“小说里的中国”过渡的失望,而宇野哲人则感慨“诗之欺我,何至于此?”从而形成了“两个中国”的印象。类似的情绪,在冈千仞、宇野哲人等人的游记中比比皆是。日人游记的出版和发行,加剧了负面中国形象的传播和流行,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和演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依托作者德富苏峰、内藤湖南、夏目漱石等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借助游记文体的亲历性,日人访华游记最大程度地宣扬了负面中国的形象,一方面,关于中国形象的知识建构为后来日本的殖民主义打下了铺垫;另一方面,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形塑,其真实可索的一面则引起了中国文化人的自我反省,并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生、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推动作用,如游记中大量的对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就波及中国思想界,促进了中国文化人关于“国民性”的讨论并对现代文学创作有深入影响。

如前文所述,晚清日人旅华游记数量众多,而笔者实际考察的只有二十本左右,加之笔者选择的多是文言体和中文译本,对一些尚未被翻译成中文的日文体游记缺乏阅读,因此,虽然本文选择的游记比较有代表性,但还是不足以说明整个晚清日人游记的复杂状况。晚清日人旅华游记是个值得深入挖掘的领域,这些游记所记载的中国形象,是我们了解近现代中国的珍贵史料。葛兆光早就呼吁,要重视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这样既可以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执偏见,也能跳出“以西方来透视中国”的单一模式,通过周边丰富文献资料 and 不同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sup>①</sup>。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在此仅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日人旅华游记被翻译成中文,为更多人熟知,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来。

注释:

①目前关于日人旅华游记的研究大多针对单个作家或单

部作品,其中,日本方面比较著名的有西原大辅的《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该书以谷崎润一郎为主要分析对象,讨论其成长背景中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其作品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书中对谷崎润一郎的上海之行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中国学界近年来对日人单篇游记作品或单个作家的研究,数量颇为可观,或讨论这些作家的中国观,或进行两两比较研究。潘世圣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对《满韩漫游》和《中国游记》进行了比较研究,赵苗的《日本人笔下的近代中国——以德富苏峰的两部中国游记为视角》对德富苏峰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做了分析,而冯天瑜的《“千岁丸”上海行》一书对1862年“千岁丸”乘员的纪行文做了研究,分析了这些纪行文所呈现的晚清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不一一列举。在这些游记中,芥川龙之介的游记是受到关注最多的,其次是夏目漱石、内藤湖南、谷崎润一郎,而因受政治身份影响,德富苏峰、曾根俊虎几人受到的关注则较为少见。另外,相对于个人研究而言,对这些游记做整体性的研究显得薄弱。

②张明杰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日人访华游记的搜集、考察和整理工作,据他介绍,日人访华游记以昭和时期的居多,大约占三分之二的比例,而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游记由于年代久远,比较难觅。而他个人收集或目睹的仅清末民初时期的游记已不下三百余种。参见张明杰:《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芥川龙之介著《中国游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③此表的排定根据的是旅行者的访华时间,因为本文主要探讨这些游记对中国形象的呈现及导致这种形象呈现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因而访华时间比写作时间和出版时间更为重要。

④参见[日]小林爱雄:《二上海的街头》,《中国印象记》,李炜译,《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第3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⑤[日]股野琢:《抵达上海》,《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张明杰整理,第16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⑥[日]冈千仞:《航沪日记》,《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第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⑦[日]宇野哲人:《二天津》,《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第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⑧⑩参见李卓:《近代日本的人口状况与人口政策》,《日本研究》2011年第4期。

⑨黄遵宪曾在《日本国志》中介绍卫生局的职能:“凡粪除街衢、疏通沟渠、洁净井灶,皆督饬府县官及警察官使地方人民扫除污秽以防疾病。”参见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卷,吴振

清等点校整理,第35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⑪[日]中野孤山:《上海港》,《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郭举昆译,第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⑫[日]曾根俊虎:《天津总说》,《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记》,范建明译,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⑬[日]中野孤山:《宜昌市概观》,《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郭举昆译,第49页。

⑭[日]股野琢:《抵达上海》,《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张明杰整理,第1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⑮[日]内藤湖南:《一大茅厕》,《燕山楚水》,吴卫峰译,第15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⑯[日]冈千仞:《燕京日记卷上》,《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第95页。

⑰[日]福井智子:《冈千仞的上海经历》,转引自《近代域外人中国行纪里的晚清镜像——以冈千仞〈观光纪游〉为中心》,叶杨曦,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2。

⑱[日]小林爱雄:《张园和愚园》,《中国印象记》,李炜译,《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第43页。

⑲[日]小林爱雄:《上海的街头》,《中国印象记》,李炜译,《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第38页。

⑳《上海新报》(第4册),文海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1812页。转引自何益忠:《晚清自治中的城市民众——以上海城市卫生为中心的考察》,《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㉑《上海新报》(第9册),文海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3890页。

㉒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63页,1982。

㉓《申报》(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影印版,第439页。转引自何益忠:《晚清自治中的城市民众——以上海城市卫生为中心的考察》,《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㉔[日]冈千仞:《苏杭日记卷下》,《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第49页。

㉕熊月之、罗苏文、周武:《略论近代上海市政》,《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

㉖㉗㉘[日]宇野哲人:《北京杂观》,《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第9、11页。

㉙[日]小林爱雄:《北京的风景》,《中国印象记》,《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李炜译,第92页。

㉚1877年,驻日公使何如璋刚踏上日本国土,到达长崎,对此处街道的清洁印象深刻,他形容此地“俗好洁,街衢均砌以石,时时扫漆”。参见何如璋:《使东述略》,第9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③[日]宇野哲人:《最初之所见》,《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第3页。

③②[日]曾根俊虎:《从日照县到张戈村》,《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记》,范建明译,第240页。

③③[日]曾根俊虎:《从安东县到汤沟村》,《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记》,范建明译,第219页。

③④[美]费正清、刘广京编:《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第57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③⑤[日]冈千仞:《沪上再记》,《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第159页。

③⑥[日]内藤湖南:《天津,凭吊,和严王二位的交谈》,《燕山楚水》,吴卫峰译,第26页。

③⑦[日]中野孤山:《从上海乘船去武汉》,《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郭举昆译,第14页。

③⑧[日]夏目漱石:《十七》,《满韩漫游记》,王成译,《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记》,第184-1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③⑨[日]夏目漱石:《四》,《满韩漫游记》,王成译,《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记》,第160页。

④①[日]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二第一瞥(上)》,《中国游记》,秦刚译,第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④②[日]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四第一瞥(下)》,《中国游记》,秦刚译,第9页。据学者潘世圣挖掘的资料,30年代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访问上海之际也对人力车夫有相近的观感。参见潘世圣:《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

④③[日]竹添润一郎:《河北境内》,《栈云峡雨日记》,张明杰整理,《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第23页。

④④[日]竹添一郎:《从宜昌至上海》,《栈云峡雨日记》,张明杰整理,《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第80页。

④⑤[日]冈千仞:《沪上再记》,《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第159页。

④⑥[日]内藤湖南:《苏州,虎丘,寒山寺,灵岩山,沧浪亭》,《燕山楚水》,吴卫峰译,第105页。

④⑦[日]小林爱雄:《黄河的流光》,《中国印象记》,李炜译,《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记》,第89页。

④⑧除了乞丐、人力车夫和苦力,对其他身份的中国平民,这些日人游记也多有记载。这些人多为日人旅行中常常打交道的跟班、随从、向导、饭店的伙计、旅馆的老板等。此外,风景名胜的看守门卫也是常常被写到的中国平民。在日人笔下,中国平民往往贪钱无度。这一时期唯一对中国人给予全面赞美的是吉川幸次郎,他历数接触的中国书店老板、店员、底层警

察、高级文化人的诚实、守信等美好品质,为中国人辩护。我们在吉川的访谈及回忆中,几乎找不到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批评文字,相反,吉川对中国知识分子及平民从多个方面给予了赞扬。吉川笔下的来熏阁琴书店主人陈济川是位重情重义的儒商,警察在吉川的笔下,也是一个让人感动的角色,可以说是我们在日人游记里难得看到的中国平民的正面呈现。

④⑨陈志让:《第一章政治的离心力(1900-1911):官、绅、军队》,《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④⑩[日]冈千仞:《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晚清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话》,《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

④⑪俞樾:《清季名流学士遗墨》,郑海麟辑录,《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④⑫钱婉约:《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关系谱系——印承与垂范的变奏》,《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内藤湖南与中国》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2013年版。

④⑬[日]内藤湖南:《天津,凭吊,和严王二位的交谈》,《燕山楚水》,第30页。

④⑭对于日本人的中国观感,中国知识分子也有“自知之明”。陈锦涛就主动向湖南说:“进入城郊,看到田地荒芜贫瘠;进入京城,看到粪土堆满街道。一望之下,就知道这个国家缺乏管理,这就是眼下的中国。您此行一定有这样的感慨吧?”参见[日]内藤湖南:《陈、蒋二氏,威海卫,上海,文、宋二氏》,《燕山楚水》,吴卫峰译,第78页。

④⑮[日]宇野哲人:《二三长沙纪行》,《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第163页。

④⑯[日]芥川龙之介:《十一章炳麟氏》,《中国游记》,秦刚译,第27页。

④⑰[日]芥川龙之介:《十三郑孝胥氏》,《中国游记》,秦刚译,第33页。

④⑱参见叶杨曦:《近代域外人中国行纪里的晚清镜像——以冈千仞〈观光纪游〉为中心》,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2。该文《〈观光纪游〉成书与版本问题再探》一节对此有十分详尽的考证分析,作者认为冈千仞在对满清社会烟毒盛行的问题上执行了双重标准。

④⑲[日]德富苏峰:《(九)清朝的兴亡》,《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刘红译,第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④⑳[日]德富苏峰:《(六〇)天宁寺和白云观》,《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刘红译,第97页。

㉑[日]德富苏峰:《(八五)黄鹤楼》,《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刘红译,第138页。

㉒[日]德富苏峰:《(五六)北海的大观》,《中国漫游记·七十

八日游记》，刘红译，第92页。

②[日]德富苏峰：《(九六)孝陵的残垣破砖》，《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刘红译，第156页。

③[日]内藤湖南：《贡院》，《燕山楚水》，吴卫峰译，第148-149页。

④[日]宇野哲人：《二二长安纪行》，《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第111页。

⑤[日]内藤湖南：《苏州，虎丘，寒山寺，灵岩山，沧浪亭》，《燕山楚水》，吴卫峰译，第105页。

⑥[日]宇野哲人：《二七苏州》，《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第187页。

⑦[日]芥川龙之介：《十二灵隐寺》，《中国游记》，秦刚译，第86页。

⑧[日]芥川龙之介：《六西湖(一)》，《中国游记》，秦刚译，第69页。

⑨[日]德富苏峰：《(八一)京汉铁路之三》，《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刘红译，第134页。

⑩虽然以负面形象为主，但在不同时期，这些游记作者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有明显区别。甲午战争之前的游记，虽然在竹添进一郎、小栗栖香顶、冈千仞的笔下，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存在极大的反差，但他们并未像后来日人旅华游记那样，对现实中国持有强烈的蔑视态度。他们对晚清政治、经济及社会种种弊端的书写或讽刺，很多方面是不乏客观而善意的，所谓“好意的苦言”，尤其是冈千仞，冈千仞对中国的兵制、学制、外交等都提出了十分具有建设性的改革建议。

⑪[日]冈千仞：《燕京日记卷上·序》，《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第88页。

⑫[日]冈千仞：《航沪日记》，《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第20页。

⑬笔谈也分优劣，比如冈千仞形容对谈者曾广钧的笔语“答词粲然”，当然这种笔谈也并非总是顺利，当遇到不通文的人，笔谈就只好中断。

⑭应满铁官员之邀到中国访问的夏目漱石的游记功利性太强，为写而写。他花费很多笔墨写与老友的重逢叙旧，对于中国文化、中国人的观察都很浮光掠影，且充满偏见。可谓既缺乏真诚，也缺乏深度，可以说是所有游记中最浮薄的一个。严格来说，夏目漱石的中国旅行，只是在进行一个例行公事的“参观”而已。

⑮刘禾：《第二章国民性话语质疑》，《跨语际实践》(修订译本)，第8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⑯这两个套话的使用显然要更早，其中“猪尾人”这一蔑称自明治时代起便在日本人口中出现。明治时期，日人辱称中

国人为“猪尾巴”或“豚尾奴”。甲午战争后，这些套话渐趋流行。参见[日]实藤惠秀：《第四章留学生与日本人》，《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51页，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⑰[日]曾根俊虎：《烟台港之图》，《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记》，范建明译，第97页。

⑱刘岳兵：《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三卷(1840-1895)，杨栋梁主编，第3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⑲参见安善花：《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双层构造及其东亚政策的矛盾性》，《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⑳参见史桂芳：《简论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变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㉑[日]小林爱雄：《自序》，《中国印象记》，李炜译，《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第16页。

㉒[日]小林爱雄：《高官的家》，《中国印象记》，李炜译，《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第41页。

㉓[日]小林爱雄：《高官的家》，《中国印象记》，李炜译，《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第41页。随着旅行的深入开展，小林开始喜欢上了中国菜，也可见最初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有所消退。

㉔[日]宇野哲人：《五论中国国民性》，《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第226-227页。

㉕[日]芥川龙之介：《八城内(下)》，《中国游记》，秦刚译，第18页。难得的是，与此同时，芥川龙之介也对自己的这种想象做出了反思，认为是“我等的偏见在作祟”，“我们都不该受此种偏见的束缚”。

㉖[日]小林爱雄：《长江大观》，《中国印象记》，李炜译，《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第79页。

㉗[日]小林爱雄：《汉水之畔》，《中国印象记》，李炜译，《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第85页。

㉘这种中国情趣部分来源于他们幼年对中国古典诗文的学习。据谷崎润一郎介绍，他和芥川是在日本普遍流行西洋文学的背景下爱好和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的，在《芥川君和我》一文中，他曾提及两人对中国古典诗文的兴趣：“当时西洋文学正盛，至少在青年作家中很少有人关心日本或者中国的古典文学。要是有谁对此感兴趣，就会被认为是思想老朽的凭证。而芥川君和我则很早就反其道而行，两个人在爱好中国古典方面称得上趣味相投。”转引自[日]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赵怡译，第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的“前理解”主要呈现在他们各自的虚构作品中。在两人的小说里，中国呈现出了一种诗意的色彩。而小说中这些中国元素多来自中国古典文本和前人的记叙。

⑧[日]内藤湖南:《今后到中国考察的人士》,《燕山楚水》,吴卫峰译,第205-206页。

⑨[日]吉川幸次郎:《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日本人的中国观》,《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第18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⑩1933年10月27日,鲁迅在致陶亢德的信中就指出了这一点:“日本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斯密思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40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第4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⑪苏明曾指出晚清日人游记存在的“互文性写作”现象,对当年的日本传播“丑陋中国”形象起到了重要推动。参见苏明:《“诗意”的幻灭:中国游记与近代日本人中国观之建立》,《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⑫具体来说,芥川龙之介游览了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南京、芜湖、九江、庐山、汉口、长沙、洛阳、北京等地;小林爱雄游览了上海、苏州、南京、镇江、汉口、北京、天津、大连、旅顺等地;冈千仞行迹遍及苏州、上海、杭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及京津之间的华北等城市;竹添进一郎则游历了京冀、豫、陕,翻越秦岭栈道,并穿越川渝,过三峡而抵上海;股野琢游览的城市主要有沈阳、旅顺、大连、北京、汉口、长沙、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地。不一一列举。

⑬同样的情形在欧美人的访华旅行记中也体现得十分鲜明。不论欧美游记还是日人游记,都记录了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在品貌性情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一现象。

⑭[日]芥川龙之介:《奇遇》,杨伟译,高慧勤、魏大海主编:《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第73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

⑮[日]芥川龙之介:《十七南国美人(下)》,《中国游记》,秦刚译,第44页。

⑯[日]芥川龙之介:《五杭州的一夜(下)》,《中国游记》,秦刚译,第67页。

⑰[日]芥川龙之介:《七西湖(二)》,《中国游记》,秦刚译,第72页。

⑱[日]谷崎润一郎:《〈苏州纪行〉小序》,《秦淮之夜》,徐静波译,第30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⑲[日]股野琢:《苇杭游记》,张明杰整理,《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第153页。

⑳[日]中野孤山:《蜀人之交际策略》,《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郭举昆译,第138页。

㉑[日]中野孤山:《芜湖》,《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郭举昆译,第24页。

㉒⑳[日]芥川龙之介:《十四罪恶》,《中国游记》,秦刚译,第35、36页。

㉓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谈到自己的写作经历,“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中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这个劳苦社会。”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青年知识(重庆)》1945年第1卷第2期。

㉔[日]冈千仞:《燕京日记卷下》,《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第120页。

㉕而在其后,两人就日记的内容也多次展开讨论。11月9日冈千仞与朱容生再次讨论日记内容,表达不同意见。朱一新认为“所谓士各为其国者”,道出了日人游记中对待中日两国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

㉖易惠莉:《中日知识界交流实录——冈千仞与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话》,《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

㉗方维规:《谁造就了“史密斯”热?》,《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3期。

㉘[日]芥川龙之介:《一芜湖》,《中国游记》,秦刚译,第136页。

㉙[日]芥川龙之介:《五医院里》,《中国游记》,秦刚译,第11页。

㉚[日]芥川龙之介:《江南游记·前言》,《中国游记》,秦刚译,第57页。

㉛[日]芥川龙之介:《十一西湖(六)》,《中国游记》,秦刚译,第84页。

㉜方维规:《谁造就了“史密斯”热?》,《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3期。

㉝[日]芥川龙之介:《十七天平与灵岩(中)》,《中国游记》,秦刚译,第99-100页。

㉞作者本人也意识到了它的不足,德富苏峰在《七十八日游记》前言中说,自己这本书缺乏洞察力和比较全面的分析,而多流于即时性的感想。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也是如此,芥川龙之介是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观察员的身份访华的,夏目漱石则是应“满铁”总裁中村是公邀请来中国,这样的受邀访华导致他们的写作不自由,对中国的观感和写作或多或少受到邀请方对中国态度的制约。

㉟参见葛兆光:《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